

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四大失衡分析与措施建议

■游敏

本文以真实的数据分析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面临的“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日益失衡”、“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失衡”、“产能过剩与内需消费不足日益失衡”、“货币供应量与社会真实财富的失衡”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展现了市场中各个利益主体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局部与整体的客观的矛盾。提出要结合当前深化改革，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注重辩证思维、辩证逻辑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学理论创新中的应用，注重市场化机制的应用范畴分析，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的发挥与应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系统地考虑不同本国的资源禀赋、实物财富规模、经济结构状况的空间属性；考虑不同经济环境、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人口变化的时间属性；考虑作为经济领域的生产与消费者的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即文化和制度的不同的能动因素。认为需要研究和把握好这三者自身的矛盾及其组合的运动与发展规律，才能有的放矢、心中有数，保持国民经济的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似乎从理论到实践都陷入了诸多的矛盾困境，而我国的“宏观调控左右为难”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政府官员和经济

■本刊记者 周新军

(上接 01 版)

记者:面对新常态的到来,你认为应该怎样做,才能把工作做好?才能保证中高速度的实现?

任玉岭:我认为:

(一)要端正认识,充满信心

面对新常态的出现,首先是一些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特别是原先善靠关系走门路的企业,面对会所人流的冷落,奢侈品销量的减少,高档餐馆的萧条,高级烟酒、礼品、家具的销售量滑落等,多少对新常态的出现有些埋怨情绪,并对发展前景表示悲观。另外也有些人存在着侥幸心理,总在问新常态何时过去,寄希望于新常态只是一股风等风刮过,又同过去一样,会所可以照开,奢侈品销量可以再升,政府官员可以再来高级餐馆大肆吃喝,高级烟酒、礼品、家具等仍可售众迎门。其实这两种想法,都是对新常态缺乏认识,这样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为国家更好服务于企业。

更需注意的是,一些人听谣传谣,说什么多少企业死掉了,多少企业外逃了,我们的经济要垮了,发财的路子到头了。对此,我曾专门做过一些调研,在温州我向一些区长了解关门与外逃企业的比例时,他们讲关门的约千分之十三至十五,外逃的约千分之五至七。听完这个,我放心了,这和听到的温州企业大批关门倒闭外逃的传言完全不同。我记得很多年前人人都讲过中关村的企业寿命只有3.9年,这就意味着,在自然生存情况下,一些企业倒闭是不可避免的,有竞争,就要有消亡。何况温州并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倒闭关门和卷资外逃呢?

应该看到,新常态是为了高质量的发展和实实在在的发展而出现的,也是为了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确保可持续发展而出现的。对新常态的到来我们应支持,应欢迎。既要看到新常态是得人心的,是能够凝聚全国人民力量,是能够更好发展的,又要看到化解已出现的各种矛盾,消化已过剩的产能,消除某些产业已形成的泡沫,这是具有一定风险的,也是需要时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听谣传谣,丧失信心,也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广大的企业家要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很好度过风险的消化期,和机构调整阵痛期,并能搞好发展方式的转变,且保证一定的离速度。企业发展结合自身的实际,开动脑筋,搞好创新,努力使本企业的发展方式跟上时代的步伐,促进企业的产品结构不断向高水平提升。

(二)要抓好机遇更好发展

习总书记今年5月在河南兰考县第一次谈到新常态时,就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习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这段谈话,首先提到的还是机遇。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所处的机遇期。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兹所讲,21世纪世界上将有两个大事件,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二是亚太地区的崛起。这两件事都与中国的发展相关,这两件事都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机遇,利用好机遇。

现在我们应该抓住的机遇有:

(1)用好城市化的机遇。

我国的城市化同工业化水平相差甚远,从现代化的目标看城市化的任务更为艰巨。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潜力将给我们带来极大发展机遇。现在城市化率53%,实际城市人口只有36%,要把我国城市化率推到80%的水平,将要有5.94亿人口在城市落户,按此人口数量设市的话,就需100万人的

学界,为此引发了不少反思。众所周知,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就是调控货币政策和货币循环。因此,我们要认清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与实质,就需要从认真分析货币的基本属性及其循环系统的动态特征入手,才能从中把握其具有本质规律性的内涵。

货币按其所有者使用的目标属性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于购买生活消费品的消费资金;而另一类则是用于投资(其手段繁多,如放贷、生产性投资、商品流通增值、乃至用于操控价格以炒作牟利等等。虽然形式多样,但其目都是“以钱生钱”——靠现有的货币聚集来更多的货币)以赚取利润的逐利资金。

在现实的市场链中,除了最终消费者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推动每一个市场交易环节的动机都是利润,而各环节参与者所得的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最终消费者支付的货币。因此,经济系统要持续运行,就必然要求:逐利资金与提供最终利润的消费资金,在数量上必须相互匹配。如果消费资金偏多则会导致产能不足,出现商品供不应求;而逐利资金偏多则会导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这种短期的失衡情况尚可以设法调整,而如果长期的单向失衡则势必危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

困难在于,我们的经济统计系统不是从

这个视角设计的,因而不存在直接反映这两类货币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间接观察这两类货币的演化历程。同时也由于经济体在增长,价格水平也在变化,所以我们如果直接观察统计数据,也难于看出货币循环的问题症结。但如果用代表经济体量的GDP这一尺度度量不同的统计数据,则将有助于我们间接地观察这两类货币的演化历程。

下面我们首先来观察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循环。

一、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演变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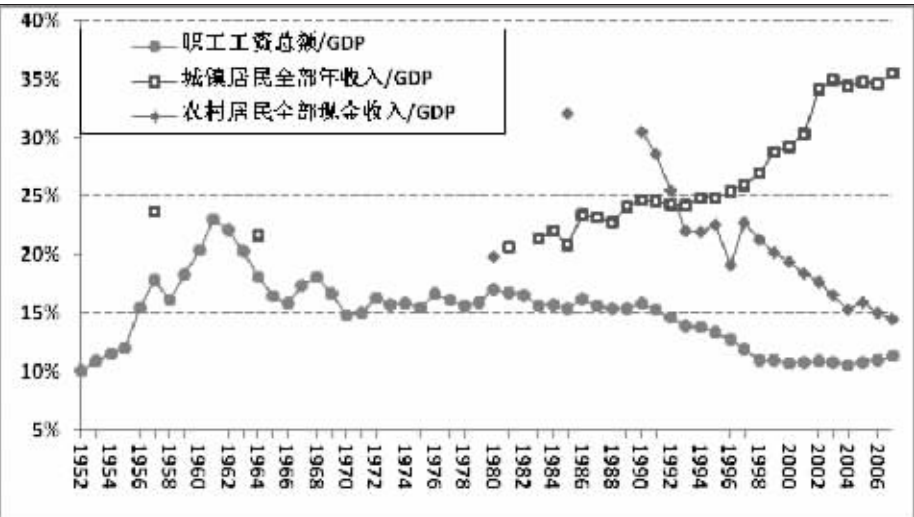
分析研究最终消费品货币可以把握我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以下我们从三个视角来观察:

1、居民用于消费的货币收入呈相对下降趋势

居民的货币收入是购买力的基础。其统计数据包括:其一是工资总额,其二是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其三是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收入。其中工资总额自1952年起即有完整的逐年数据,而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分别由城调队、农调队入户抽样调查得出人均值,再乘以城乡人口得出,但可得数据不如

职工工资总额完整。这三组数据比较见图1.1:(注:以下所有数据都来自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工资总额占GDP的份额从建国初年的10%升至1961年的23%,此后,降到15%左右,并一直维持到1991年,然后逐年下降,到2004年仅为10.6%,与建国初的1952年接近,此后微幅回升,到2007年为11.3%。这说明从工资的角度看相对与GDP的购买力,则我国1991年以来



1.1 图：工资总额与城乡居民现金收入

适应、引领新常态 确保质量快发展——访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参事任玉岭

确保质量又要争取中高速的发展中注意哪些问题?

任玉岭:我认为有以下五个问题需牢牢坚持和把握:

(一)必须重视和坚持文化事业大发展

新常态欲达其发展目的,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搞好文化发展,总结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大大发展,最让人不满意的是文化发展的迟滞和偏斜。由于文化发展的重视不足,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出现了不少问题。铺张浪费、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引发了一切向钱看和不择手段的追求利润最大化,造成了贪污腐败、权色交易、权钱交易流行官场,使一些官员不作为、无作为、乱作为,既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危害,也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秦皇岛一个管水务的小科长,家中竟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斤,房产68套,国家发改委连续有五个司局长受赠近20亿元,在权钱交易中,拿国家的政策当儿戏,以致造成国家降药价20多次,而药价不仅不降低,反而连续升高,由此造成的很多人看不起病而死亡者,按网上的说法超过一次大的战争,超过一次瘟疫的大流行。这样一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都与对传统文化的丢失和文化发展的沦丧直接相关。

为了按照习总书记要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计划落到实处,必须通过文化发展涵养人们的价值观和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以堵塞各种漏洞,消除诸多丑恶。

中华文化有很多优良传统,是涵养价值观的肥沃土壤,可以陶冶人的诚信与善孝品德及爱国齐家的情怀,从而给社会带来强大凝聚力,推动力、竞争力。习总书记在上海任书记时就指出了文化对经济有推动力,对思想建设有感召力,对环境建设有辐射力,对人才培养有铸造力,因此高度重视文化力,是有益于补偿新常态发展的动力的。

1988年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巴黎联合发表宣言说,“人类未来要更好赢得自己的发展,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继承”。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有许多值得精神的,因此,对我们的文化绝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妄自尊大,中国的文化产业还很薄弱,美国、法国文化产业占GDP25%,日本占17%,这是一个极广阔产业领域,应该予以重视,使文化产业为新常态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必须重视和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问题

党的十八大把创新驱动提升了战略地位、核心地位。这些年来,创新投入年年大幅增加。我国有100多万研发科技人员,每年创新科技成果达数十万项之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10%,这就意味着90%的科技成果打了水漂。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成由勤俭败由奢”,如此多的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如此多的科技投入,人力、物力打了水漂,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浪费。对此如若视而不见,就有可能把科技大厦摧毁。

我们在进行科技创新调研中,到处都在讲投入不足,都在伸手要钱。包括诸多重点大学在其改革方案中谈到科技成果转化时,也都是认为需要加大投入。其实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并非是加大投入可以凑效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归根结底是很多成果不成熟或不是成果导致的。

科技成果,就像是树上的果实,成熟的桃、杏、李、苹果、梨,又甜又香,受人喜爱,争着购买,而不熟的这些果实又酸又涩,人们肯定不予问津。根据我在科技战线五十多年的工作体会,各项经济指标达到生产要求能够产生较好效益的科技成果常常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的,而主要经济指标达不到要求的科技成果是谁也不愿推广的。

因此,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必须要从项目立项、经费分配和成果鉴定上把好关,要克服这方面存在的关系学,浮躁风以及腐败行为,坚决改变以论文论英雄的路径惯性、“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路径惯性、靠关系配资源的路径惯性。

为了确保科技成果的成熟度,首先需要在立项时强化对技术成果的审定,使项目攻关技术指标,运用于生产后,能够有好的经济效益。其次要在成果审定中,防止对非成果大量放行,更要杜绝把评审会开成庆功会。同时要增设中间试验环节,改革科研与生产的两张皮。对成熟的科技成果推广,要给予政策支持,要借鉴韩国的“身土不二”精神,让更多的政府采购国人用自己的新产品。

(三)必须重视区域统筹,防止地区差距过大问题。

改革开放初,我们实行了沿海经济战略,就是为了让有限的资金和资源产生更高效益,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实行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的战略,对改善地区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不能不看到,我们的地区差距至今仍有十分严重,地区差导致了发展的不和谐。有人说这是地理人文和历史条件造成的。这固然有其道理,但从根本上看还是发展政策支持不力或扶植政策的精准度不够造成的。

我每年走25个省以上,依我亲眼看到的情况来评价,最差的地方还是在中部,尤其是平原地带的粮食产区,在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是最为贫困的。就拿义务教育来讲,在那里无论是学生住宿条件、就餐条件,试验课的条件,信息课的条件,操场与体育的条件,不要说同东部相比了,也远不如西部的学校好。

为此,在经济的空间布局上,在实施东中西及东北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上,应该像精准扶贫那样,做一些精准的地区统筹,粮食安全是国家的安要保证,对生产粮食,供应粮食的农户,要多一些支持政策。

我们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哪里科技发达,哪里的经济就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但是,至今我们的科技投入,科技人才、科技开发区还都集中在东部,东部占全国20%的省份拥有中国35%的高校,40%的科研机构,50%的科研经费,60%的科研经费,70%高技术企业。特别是人才随着资金流动的情况下,不注意改革科研经费的配置,仍将60%的科研经费放在20%的发达省份当中,那么中西部的科研经费上不去,科技水平上不去,中西部也必然将落后。

(四)必须控制房价和认真解决入城农民工住房有其必须问题。

城市化是中国的大方向,过去的30年没能处理好城市住房问题和过分限制农民进城自建房,导致了很农民工在城里30多年了,仍然居者无其屋。现在城市门槛越来越高,农民工入城住房问题越来越突出。为

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关于农村居民全部现金收入(统计口径中,农村居民全部现金收入既用于消费支出,也用于生产支出)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19.8%,到1985年升至32%,然而此后持续而迅速下降,到2007年仅为14.4%。可见过去20多年,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的相对能力也明显下降。

(下转 04 版)

了适应城市化的大发展,和改善农民工的民生问题,必须坚持控制房价和下决心解决好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决不能把房地产当做产业,为了保GDP增速而放松对房价的监管。

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农民工因在所居城市买不起房,而是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投到农村去建房或是在远隔千里的家乡去购房。现在在很多农村和县市的住宅被空置,这不仅解决不了农民工的居住需要,而且造成农民工在城市消费能力的降低,不利于经济发展。

虽然有些城市为农民工盖了公租房,但往往因公租房偏远,或价格偏高,或数量过少,难以对居者有其屋做出贡献。北京很多住房都将大间隔成小间对外出租,数量很大屡禁不止,甚至一个84平米的住房被28人合租,这都表明提供和解决住房在一些城市是何等的急切和需要。

为了解决广大农民工入城后的居住问题,和使农村走出的大学生能够在城市里有个房安个家,应该考虑继续启动经济适用房建设,很有必要学习澳洲的做法,房屋建设一些“可承受性”住房,使住房价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3倍左右,并对购首套住房者予以补贴。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需要大发展的地级市与县城,可以划出若干地块和区域,经过七通一平后,划出红线,做好规划,给出多样规格的建设图纸,让入城农民自建房。这样不仅可以推进城市化进程,促农民变市民,而且可以降低政府对住房投资的财政压力 and 难题。

(五)必须重视和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过低问题

我国传统产业过剩已成为消减产能面临的大问题。但仔细研究一下,很多传统产业面对13亿多中国人的需求,是本不该过剩的,这种过剩虽客观存在,则是因为低收入人群收入过低,缺乏购买能力造成的。例如冰箱、彩电、厨具、家具等是本应有更大市场的,但因为数以亿计农民工连房都买不起,都在那里凑合,都在那里蜗居,当然就谈不上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了。如若这数以亿计的人收入都能得到提高,都能有房住,有家归,相信很多家电、家具都会有井喷式的增长,产能就不存在过剩。

因此,无论从民生改善与构建和谐社会考虑,还是从发展群众出发,我们都应该高度重视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过低问题。近年来在解决低收入问题方面虽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因既得利益的藩篱的存在和既得利益阶层话语权过大,还是给这些措施的制度与实施造成众多阻力。

当今社会不和谐的重要表现和根源就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收入分配的畸形化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之间,而且还严重的存在于同省、同市、同行业、同级别、同年龄之间。我们不主张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但也不赞成一些“理论家”动辄把求公平的说法扣上“平均主义”的大帽子。我们关注公平分配,特别是关注把公平分配贯彻到社会最底层,就是关注国家的整体发展,关注以人为本,关注中华民族的复兴。

已经有人提出,工人除了获取雇工资外,还应该“以劳为本”参与企业分红。劳动力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的剩余价值分配不应该与他们无关。基于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那么企业的剩余价值就应该将劳动者的分配权。可否把研究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即红利的分配权作为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突破口,不妨在方法上进行一些必要的探索和研究。

(完)